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述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研究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方方面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水平、视野和方法得到不断提升。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内容重点未与时俱进，研究视野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这些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五四运动研究的兴盛，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五四运动的一个热点话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受到学界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繁荣活跃的新时期。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9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是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学术界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如：思想解放的潮流、海外五四运动研究成果传入、“文化热”等因素，掀起了对五四运动进行重新评价的热潮。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五四”阐释的经典观点进行研究，并就毛泽东“五四”阐释的一些观点进行争论，如：“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五四运动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彻底性”，其中不乏有对毛泽东的“五四”阐释进行贬斥的观点。

第二阶段：从1999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至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的兴盛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前一阶段明显增多，学术界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作出的“五四”阐释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各个具体革命历史阶段的“五四”阐释进行研究。同时，对具有代表性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五四”阐释进行专题研究，还通过“五四”纪念的研究视角来研究“五四”阐释。此外，善于将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与国民党或其他思想流派的“五四”阐释进行比较研究。总体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研究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的拓展。

第三阶段：从十八大到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的深化期。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是抓住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历史意义进行研究，强调“五四”阐释的意义关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百年历程做整体性的研究，这是前期研究较少涉足的方面。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学理性，研究内容更具时代性。

二、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的热点与重点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内涵和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阐释的五四运动包含哪些方面，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阐释的五四运动是包括了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并且文化运动是从属于政治运动的，而且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相互统一的。[[1]](#footnote-1)在考察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百年历程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百年历程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试图将“五四”阐释建构为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2]](#footnote-2)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凝练概括五四精神的百年历程显现出三个特点：“与时俱进，聚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始终把教育青年作为赓续和弘扬五四精神的根本任务”[[3]](#footnote-3)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四”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四”阐释；另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四”阐释。两个部分的“五四”阐释学术界都有研究，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四”阐释更受学者们的青睐，而且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划分为若干革命阶段，做“五四”阐释的断代史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以前的主要是强调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并凸显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4]](#footnote-4)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认为五四运动是失败的，持否定态度。[[5]](#footnote-5)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重新反思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并从抗日救国的角度出发，借助“五四”的力量动员群众参加抗日。[[6]](#footnote-6)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时期，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充分发动学生群众参加到实际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7]](#footnote-7)

（三）中国共产党重要代表人物“五四”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也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过程，期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做出的“五四”阐释，一方面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阐释者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学者们围绕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习近平等重要代表人物的“五四”阐释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关于陈独秀、李大钊“五四”阐释的研究

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是最早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他们的“五四”阐释作了研究，认为他们不仅将五四运动理解成新文化运动或学生运动,而且突出五四运动的政治色彩。李大钊是早于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五四运动的。[[8]](#footnote-8)学术界普遍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的“五四”阐释是中国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萌芽。[[9]](#footnote-9)

第二，关于瞿秋白“五四”阐释的研究

当前学术界探讨了瞿秋白“五四”阐释的特色、意义及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瞿秋白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及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更具列宁主义色彩的理解，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二是瞿秋白的“五四”阐释预示着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初步确立，且“五四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对毛泽东“五四”阐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三是认为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五四新文化持否定态度，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实则是强调争夺文化领导权。[[10]](#footnote-10)

第三，关于毛泽东“五四”阐释的研究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从实践需要出发五四运动进行阐释，并且这种“五四”阐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成熟形态。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开始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优缺点及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反思与评价。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五四”阐释的研究涉及内涵、特征、历史背景及历史意义等几个方面。首先是围绕毛泽东“五四”阐释的内涵展开研究，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是站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与评价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认为毛泽东“五四”阐释将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赋予五四运动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11]](#footnote-11)；二是认为毛泽东站在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高度，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作用作了全面的评价。[[12]](#footnote-12)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五四”阐释的基本取向是以政治运动含括文化运动，突出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救亡意识,思想启蒙意义被政治意义解释，甚至被忽略。[[13]](#footnote-13)有学者围绕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阐释进行专门研究，总览其成，可以归纳为三维说、四维说和五维说，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围绕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几个方面展开的。关于毛泽东“五四”阐释的背景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是毛泽东“五四”阐释的现实语境。关于毛泽东“五四”阐释的历史意义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指出了毛泽东“五四”阐释的历史地位，即为中国共产党人认知五四运动奠定了基调，为研究五四运动确定了方向。[[14]](#footnote-14)二是为党指导和开展青年工作及促进青年成长指明了方向，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15]](#footnote-15)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理论阐释和毛泽东的其他革命理论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形态，并且意味着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五四”阐释的把握。[[16]](#footnote-16)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五四”阐释是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五四”观的总结，也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 “五四”阐释的纠正。[[17]](#footnote-17)

第四、关于习近平“五四”阐释的研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视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每年五四来临之际总是会走到青年中间去纪念五四。习近平关于五四运动重要讲话也成为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学界对习近平“五四”阐释的研究主要是揭示习近平关于五四运动重要讲话的意义关联，普遍认为习近平的“五四”讲话为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与目标，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展现了习近平青年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整体性特征[[18]](#footnote-18)；二是重在宣扬新时代青年应将实现中国梦作为追求的理想[[19]](#footnote-19)；三是探讨了新时代青年为什么要和怎样弘扬五四精神，并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五四精神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任务相结合，实现了党对五四精神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20]](#footnote-20)。

（四）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是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五四纪念，将“五四”与现实相勾连的一种意义赋予，而这种意义赋予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首先从学术界关于其实践意义方面来说：有学者探讨了阐释者与“五四”阐释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陈独秀 、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与评价自身发起和参与五四运动的过程既是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增强了他们革命的动力和加快了他们走向建党的步伐，使他们获得了理论式和行动上的进步。[[21]](#footnote-21)有学者研究了“五四”阐释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形象建构展现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与追求。借助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合法性的增益。[[22]](#footnote-22)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五四”阐释对中国革命、建设的积极意义，认为“五四”阐释服务于国家崛起，集中表述于时代目标的实现，通过五四纪念为中国革命、建设做精神动员并提供精神支撑。[[23]](#footnote-23)其次从学术界研究其理论意义方面来说：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导向关系，认为其对正确评价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反对贬抑五四运动的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怪论具有批判作用。[[24]](#footnote-24)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在理论上的关照，是关乎如何看待中国历史走向和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25]](#footnote-25)

三、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研究形成的共识与产生的分歧

经过四十年的研究与探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形成若干共识与分歧：

（一）共识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是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渐进生成的，期间，依据时代主题的变换，在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之时“五四”阐释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由革命话语的“五四”阐释转变为建设话语的“五四”阐释，积极倡导“五四”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革命话语的“五四”阐释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形成了，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期、初步确立、正式形成三个阶段，发端于陈独秀、李大钊等早中国共产党人，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形成于毛泽东。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与建构意识形态的关联。“五四”阐释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知识与思想来源。[[26]](#footnote-26)中共借助“五四”阐释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为了争夺政治价值主导权，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义正当性。[[27]](#footnote-27)

（二）分歧

第一，毛泽东“五四”阐释的局限性。毛泽东既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也是五四运动的阐释者，毛泽东从亲身经历这一角度出发，揭示了五四运动的现实启示。但是，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激进的社会革命论者,在五四运动中是时代的弄潮儿。对自我创造的肯定,很大程度影响并决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观,也造就了他对历史认识的局限。如果我们照抄这种观点,显然无助于对五四运动的合理解释。[[28]](#footnote-28)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对研究五四运动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本身具有一定的夸大性和虚构色彩，而且对其他不同的“五四”阐释具有排斥性。这容易使大多学者只受革命话语的“五四”阐释的影响，而形成思维定势，进而不利于五四运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29]](#footnote-29)

四、研究展望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于我们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新时代弘扬五四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还应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今后研究提供努力的方向。

第一，研究内容要紧跟时代步伐。40年来，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五四”阐释着墨较多，尤其是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五四”阐释，由于围绕上述内容研究的密度过大，导致出现选题、观点、引用材料相似的重复性研究的现象。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阐释，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五四”阐释落笔较少。习近平“五四”阐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做出的最新阐释，这对于弘扬五四精神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指导五四运动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人进入了新时代，而思想观念和研究重点还停留在原来的起点上，必须与时俱进，应把习近平“五四”阐释作为研究的重点。要看到，习近平的“五四”阐释既有对前人“五四”阐释的继承，也有原创性的观点。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30]](#footnote-30)等原创性的内容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第二，注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40年来，学术界研究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百年历程划分成几个历史阶段的多，而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百年历程归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少。这样尽管可以更加细化某一历史阶段“五四”阐释的研究，但却忽略这一过程的整体性研究。比如对这100年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历程演变轨迹是什么？每一阶段的“五四”阐释在整体链条中的作用是怎样的？显然，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由于缺乏整体性研究意识导致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31]](#footnote-31)所谓坚持大历史观，既是将“五四”阐释放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去观察研究，纵向考察各时期“五四”阐释的内在逻辑。今后的研究要从100年的“五四”阐释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的整体性研究视野出发，要善于探究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主题、演进规律及历史逻辑。

第三，重视研究方法的拓展。40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依据大量史料对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进行描述性研究，理论性研究比较缺乏，导致对“五四”阐释的意义研究还不足。但是“五四”阐释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赋予的过程，因此今后的研究还要深挖“五四”阐释的意义关联。而且中国共产党人百年“五四”阐释既反映了百年历史的变迁，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探究这些问题，就不得不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法，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出发，揭示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此外，要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一是要注重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不同人物“五四”阐释比较；二是加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比较研究；三是要将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五四”阐释的比较研究；四是要善于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与其他思想流派“五四”阐释的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方能凸显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科学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探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发展过程，而且有利于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正确的观点及驳斥其错误的观点。

1. 段治文，张帅：《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历史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5页；郭若平：《建国前中共对五四运动评价方向的把握与解释》，《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第62页。 [↑](#footnote-ref-1)
2. 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9页。 [↑](#footnote-ref-2)
3. 丁俊萍，高晓晨：《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精神的认识历程及其特点》，《嘉兴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45页。 [↑](#footnote-ref-3)
4. 欧阳军喜：《是“五四”，不是“五四”》，《民主与科学》2000年第2期，第15页；陈亚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的认识历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页；张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解读》，《求索》2006年第1期，第60页。 [↑](#footnote-ref-4)
5. 徐文杰：《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解读》，《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6期，第120页。 [↑](#footnote-ref-5)
6. 徐文杰：《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解读》，《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6期，第121页；周游：《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的纪念》，《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夏之卷。 [↑](#footnote-ref-6)
7. 欧阳军喜：《“五四”的变奏：1946-1947年的“新五四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 [↑](#footnote-ref-7)
8. 张艳：《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footnote-ref-8)
9. 张艳：《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0页；陈卫平：《八十年的“五四”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1页。 [↑](#footnote-ref-9)
10. 徐文杰：《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解读》，《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6期；胡明：《从“五四”到“无产阶级新五四”——瞿秋白“文化革命”情节剖析》，《社会科学缉刊》2008年第3期；陈卫平：《八十年的“五四”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刘中望：《资源批判与语义转移——瞿秋白的“五四”观》，《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1期；孟永，徐丽丽：《阶级革命视域中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新文化运动观考论》，《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张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解读》，《求索》2006年第1期；董德福：《“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节》，《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彭维锋：《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footnote-ref-10)
11. 梁磊：《建国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五四运动评论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 [↑](#footnote-ref-11)
12. 郭若平：《建国前中共对五四运动评价方向的把握和解释》，《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 [↑](#footnote-ref-12)
13. 董德福：《论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反省》，《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 [↑](#footnote-ref-13)
14. 叶美霞，田子渝：《中共对五四性质的讨论》，《学海》2002年第5期；肖贵清，刘治君：《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的分析和评价》，《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李维武：《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陈亚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的认识历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footnote-ref-14)
15. 李少齐：《毛泽东“五四”观的内涵及其意义探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footnote-ref-15)
16. 郭若平：《毛泽东的“五四”观及其评论模式的形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郭若平：《“五四”评价取向的历史转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0期。 [↑](#footnote-ref-16)
17. 董德福：《论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 [↑](#footnote-ref-17)
18. 王延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 [↑](#footnote-ref-18)
19. 郭辉：《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兰州学刊》2019年第2期。 [↑](#footnote-ref-19)
20. 石国亮：《五四精神与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丁俊萍，高晓晨：《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精神的认识历程及其特点》，《嘉兴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footnote-ref-20)
21. 陈亚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的认识历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页。 [↑](#footnote-ref-21)
22. 段治文，张帅：《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历史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8页。 [↑](#footnote-ref-22)
23. 郭辉：《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兰州学刊》2019年第2期；陈金龙：《五四纪念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5页；段治文，张帅：《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历史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8页。 [↑](#footnote-ref-23)
24. 李维武：《“五四”评价分歧的由来及其正确导向》，《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10期，第75页。 [↑](#footnote-ref-24)
25. 卢汉：《关于五四运动评价的百年回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第87页。 [↑](#footnote-ref-25)
26. 郭若平：《建国前中共对五四运动评价方向的把握与解释》，《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第66页。 [↑](#footnote-ref-26)
27. 孟永，徐丽丽：《阶级革命视域中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新文化运动观考论》，《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 [↑](#footnote-ref-27)
28.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反省》，《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第111-112页。 [↑](#footnote-ref-28)
29. 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第38页；郑家建：《阐释与过渡阐释——20世纪中国精神想象中的五四》，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Z4期。 [↑](#footnote-ref-29)
30.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footnote-ref-30)
3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4月21日。 [↑](#footnote-ref-31)